

中国外交 3.0 版: 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

赵可金

摘要: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 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发展压力均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 对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思维形成了严峻挑战, 要求推动中国外交转型, 在更宽视野和更高平台上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规划, 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 正从“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将呈现为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外交的 3.0 版外交, 步入了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关键词: 中共十八大; 外交转型;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7-0004-11

作者简介: 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084)

引言: 中国外交转型

近年来, 围绕中国崛起及其外交走向, 国际学界展开了持续的热议讨论, 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各种理论假说纷至沓来^①。美国学者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对中国外交的战略辩论进行了梳理, 提出了本土派、现实主义、大国派、亚洲第一派、全球南方派、选择性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等若干观点, 认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外交的看法已经多极化了^②。此外, 新近出版的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 的《邓小平时代》、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的《论中国》以及美国中国研究的主流学者沈大伟、谢淑丽 (Susan Shirk) 等都开始关注中国新外交, 认为中国外交开始步入新一轮调整和转型之中^③。

收稿日期: 2013-04-05

①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Pobzeb Vang, *Five Principl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Author House, 2008; David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Zhu Liqun, "China's Foreign Policy Debates", *Chaillot Papers*, Pari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ropean Union, 2010; Robert G. Sutter,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② David Shambaugh,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 34(1), pp. 7-27.

③ 参见 [美]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冯克利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美]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 胡利平译, 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vid Shambaugh, *Charting China's Fu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1.

在国际学界对中国崛起辩论的激励下,近年来,中国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外交转型的问题。围绕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外交转型,中国外交转型的目标、任务、道路和方向问题,国内外学界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①。在国内学界,王逸舟教授是较早进行中国外交转型研究的学者,他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化视野中,讨论中国外交的转型问题。他在《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新取向》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将中国学界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观点概括为全球治理论、海外利益论、新型主权论、慎用武力论、王道霸道论、抑制情性论、战略疆域论、社会民言论、国际公关注论、利益分层论、复杂现象论、世界大势论,等等^②。所有这些争论的核心是如何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外交与发展的关系,外交不仅要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要依靠发展、赢得信誉。与此相应,中国要不要调整不结盟的原则,要不要调整不干涉内政,要不要调整不在海外驻军,要不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要不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外交学界作出明确的回答。中共十八大确立了未来十年中国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围绕国家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中国外交转型正在成为中国外交发展的一大特征。

一、转型依据: 压力型外交

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③。与此同时,十八大报告也清醒地意识到,当今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国际国内形势均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外交已经呈现为“双面博弈”的格局。在国际上,中国外交面临着更多可以预测和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危机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后果日趋显现,中国的发展成就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各种怀疑、担忧、恐慌和防范中国的声音不断出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步入了“树大招风期”。在国内,“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强国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建设生态文明等艰巨任务,到 2020 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外交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的发展利益。因此,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中国外交面临着两大挑战。

1. 安全压力急剧上升

21 世纪初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就是中国的持续崛起。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急剧上升,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中国外交的周旋余地和弹性空间被大大压缩。十八大报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⑤。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不仅有传统安全威胁,也有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充满了不确定性。

从传统安全威胁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壮大,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传统安全责任有所上升,国际安全压力也逐步加大。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最大的安全压力来自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自 2009 年以来,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不断强化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① 王逸舟 《论中国外交转型》,《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5 期; 庄虞友、杨束芳 《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理论研究》2008 年第 4 期; 刘胜湘 《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第 1 期。

^② 王逸舟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3—148 页。

^{③④⑤}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版。

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 (TPP), 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给亚太地区制造了紧张态势^①。同时, 地区动荡频繁发生, 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朝鲜半岛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六方会谈陷入僵局。黄海、东海和南海地区争端联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局势复杂, 各方力量仍在持续博弈。随着国际化加速发展, 中国在周边和世界各地均面临着日益上升的安全压力。

从非传统安全威胁来看, 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 中国海外利益加速拓展, 新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在十八大报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 比如大规模传染病、严重自然灾害、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 等等, 诸如此类的新安全问题如果处置不当, 均可能上升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全局的总体威胁。因此, 十八大报告强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 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倡导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②。这是新时期中国对国际环境认识的升华, 中国不再把安全仅仅视作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 更将其视作涉及世界各国的人类安全问题, 中国不仅要努力维护自身的安全, 更要为整个世界和人类安全作出贡献。

2. 发展任务日益艰巨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未来十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 特别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 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结构和体制机制的调整, 无异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与外部环境相比, 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内部矛盾更多, 任务更重, 难度更大, 外交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相互转化速度更快,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外交问题。

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 胡锦涛强调, “新形势下, 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 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发展利益”^③。这一思想对中国外交增强服务发展的意识, 提升服务发展的能力, 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八大报告强调, “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外交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日益突出以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 以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为主要平台, 有效应对各类涉外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 不断增强服务发展和促进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 十八大强调, 既要注重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也要强调依靠发展, 争取主动, 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在参与国际事务中, 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妄自尊大,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 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④。显然, 中国外交正在强调积极运用发展资源, 向世界展示更加自信从容、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胸怀、心态和姿态, 同时给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此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断增强, 利益格局的深层调整释放了各方参与外交的积极性, 网络问政、媒体参政、社会议政, 使得中国外交面临着

^①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accessed on June 1, 2012; 钱文荣 《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调整及对我影响》, 《亚非纵横》2011 年第 2 期。

^{②④}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版。

^③ 钱彤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召开 胡锦涛、温家宝讲话》, 新华社北京 2009 年 7 月 20 日。

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维护和巩固中国发展势头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阻力在加强,中国外交受到的批评声音趋于上升,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难度在加大^①。承受压力和化解压力的压力型外交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转型内容: 动力型外交

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都对 中国外交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求中国外交更加开放包容,更加积极有为,更加进取担当,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外交事务的表述来看,中国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都有突出表现,中国外交正在从“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

1. 在外交心态上,更加自信从容

一个国家国力越强大,与世界联系越紧密,越需要形成一种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的外交心态,它是一国外交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②;在面对国内外种种低估或高估中国发展成就的舆论时,强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一方面,强调中国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全党都要有高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强调“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③。

在外交心态上,中国既没有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惊慌失措,也没有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就而忘乎所以,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也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表现出高度的自信从容,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自信从容的外交心态对于维护和巩固战略机遇期,保持中国外交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决定了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既不会像国际舆论所担心的那样“充满不确定性”^④,也不会像国内舆论所批评的那样“被动应付”^⑤,而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着眼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始终保持不急不躁的自信从容,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有明确的行为规律和鲜明的中国特征。

2. 在外交姿态上,更加积极有为

心态决定姿态。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自信从容,在外交姿态上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有为,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强调要“大有作为”,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调加强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强调“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强调“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

^① John Pomfret, “Newly Powerful China Defies Western Nations with Remarks, Polici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2010; John Pomfret, “China’s Strident Tone Raises Concerns among Western Governments, Analyst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10; Andrew Small, “Dealing with a More Assertive China”, *Forbes*, February 18, 2010; Joseph S. Nye, “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10, 2010;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ese Tiger Shows its Claw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10.

^{②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④ Evan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⑤ 侯峰《“翻译外交”扭曲了中国外交》,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zlwj/article_2012092968634.html.

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不难看出,中国外交开始逐步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争取”转变,即由注重服务发展、促进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向同时也强调依靠发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和影响转变^①。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在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改革问题上,也开始从“接受者”、“应对者”的角色向“建设者”、“塑造者”的角色转变。

面对国际社会的众多热点和难点,中国并非采取一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姿态,而是强调在继承中求新、求变、求和。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关注海洋利益、海外权益、网络安全、太空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对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和态度,重点提及了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强国际话语权、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主张,这些立场和主张都集中体现出中国努力实施坚持原则、不避责任的大国外交。可见,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上,中国都表现出一种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更加积极作为的姿态。积极有为成为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征。

3. 在外交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

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怎样看待当今中国,是事关中国外交理念的核心问题。十八大报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归结为“四化”,首次将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并列提出以强调其重要性,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与一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以邻为壑,靠牺牲他国利益来寻求本国利益的作法不同,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兼顾”、“平等”、“均衡”、“共赢”等思维,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符合当今国际环境的实际,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的方向。

正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十八大报告在坚持“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若干新精神,在中国外交旗帜上,在和平、发展、合作的基础上再加上“共赢”,明确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②。强调中国外交政策将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负责任,在当今国际关系实践中,这些精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与“颜色革命”、“文化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理念不同,中国对多种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选择,互相借鉴不同文明的经验和成果。显然,这些国际关系新精神的提出,是对和谐世界理念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此,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强调“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等。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习近平强调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③。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站在民族责任、人民责任和党的责任高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总方针。以了解为轴心,努力建立一种协商对话的新国际关系,开放包容成为十八大后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④。

① 谢方 《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将更加积极主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1日。

②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③ 习近平 《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新华社北京2012年7月7日。

④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国日报网,2012年11月16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tips/news/2012-11/16/content_15936733.htm。

4. 在外交行为上, 更加进取担当

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 是中国外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策略总方针, 它不仅构成了中国的外交文化, 更成为中国外交行为劝谈、维稳、促和的根本取向,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表现出极大的立场模糊性和策略灵活性, 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然而,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壮大, 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作出更大国际贡献。2012年12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时说, “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同时也要处理好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既争取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发展自己, 也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①。他多次强调, “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 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实践者”^②。显然, 中国将在外交上更加强调国际责任, 努力在国际事务作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 与以往仅仅强调营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倡议不同, 十八大报告显示出了敢于担当的明确立场, 不但明确强调反对什么, 比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颠覆他国合法政权、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而且也明确强调支持什么, 比如明确提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国际规范, 强调权利与责任平衡一致的国际原则。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国防等众多领域, 中国外交强调大胆进取, 敢于担当, 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主张, 比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提出了“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 惠及周边国家”、“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③。所有这些提法集中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中国外交不再仅仅强调经济利益导向, 不仅强调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而且强调依靠发展,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作出更大国际贡献。因此, 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将敢于表态、敢于担当、注重信誉, 向着更加合作共赢、责权一致和进取担当的方向转型。

不难看出, 十八大规划的中国外交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动力型外交, 它在心态上更加自信从容、在姿态上更加积极有为、在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在行为上更加进取担当。相比之下, 未来的中国外交将更强调战略上的布局谋势, 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平衡: 一是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平衡。在外交使命上除了强调传统的服务国际经济建设之外, 也强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追求秩序和治理的平衡、平等和公平的平衡、反霸和共赢的平衡、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在外交战略布局上, 强调建立更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既强调与主要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强调与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也强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 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三是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的平衡。在外交策略上, 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妄自尊大。一方面, 强调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决定了中国外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需要“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方针,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另一方面, 强调以更加积极有

①② 钱彤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 新华网, 2012年12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05/c_113922453.htm。

③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为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转型方向: 3.0 版的外交

中共十八大规划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外交前进的方向,从其所承担的外交使命、所谋划的外交战略布局和所实施的外交策略总方针来看,它将推动着中国外交进入3.0版阶段。所谓3.0版的中国外交,是相对于自1949—1979年的中国1.0版革命外交和1979—2009年的中国2.0版发展外交之后的新外交形态。1.0版的革命外交特征是与帝国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外交体系决裂,并把反对帝国主义、推动国际主义合作、维护国家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使命,在外交战略布局上谋划明确敌我友的结盟外交,在外交策略上坚持国际统一战线的思维,是一种致力于世界革命的统战外交。2.0版的发展外交特征是实施改革开放,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把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和使命,在外交战略布局上实行不明确敌我友的和平外交,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战略,在外交策略上坚持韬光养晦的策略总方针,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一种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作外交。

相比1.0版的革命外交和2.0版的发展外交,十八大规划的未来中国外交,强调在继续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国际环境以及维护和巩固中国崛起势头的基础上,积极捍卫和保护中国日益扩大的海外权益、海洋利益、极地利益、太空利益和网络利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做负责任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一个令世界尊敬的国家,不断提升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体来说,3.0版的中国外交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 在目标使命上,强调公平正义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外交的目标使命取决于中国国家目标的设定。中国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异常繁重。“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①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意味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和平等的国家权利,由此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和使命,是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国际权利。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在外交上谋求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目标上强调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中国综合国力实现了巨大提升,国家繁荣富强,已经从一个国际社会中的边缘角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中的显赫角色^②。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如何维护公平正义,将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和使命。在国外,要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注重“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内,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中国人民所共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② Mark Beeson and Fujian Li, “Charmed or Alarmed? Reading China’s Reg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3), pp. 35-52; James Reilly, “A Norm-taker or a Norm-maker? China’s ODA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3), pp. 71-92.

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①。十八大报告在外交目标上,从强调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理想转变为强调“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更注重可操作的国际公平正义。强调公平正义,意味着中国外交不仅强调国家平等,更强调国际规范,强调制度规则和体制机制的公平正义,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转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外交影响。

一是中国外交的立场从强调国家正义向更为强调国际正义转变。尽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也强调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强调“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②;但更多从国家角度考虑国际问题,始终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认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淡化意识形态影响,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④,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和“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因此,强调公平正义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意味着“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外交更强调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一种强调共同利益、共同规则的国际正义观,意味着中国外交既不寻求“另起炉灶”,也不甘于“安守现状”,而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履行国际责任,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是中国外交的原则从强调国家平等向更为强调国际公平转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坚持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友好性质的国家。我们希望你们发达起来,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⑥同时,始终坚持不干涉内政,认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⑦。十八大报告在继续强调国家平等原则的同时,更加强调国际公平原则,强调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所有这些提法都意味着中国外交强调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强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强调支持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维护和提升国际公平。

2. 在战略布局上,强调立体外交

战略布局是一国外交最主要的依托。受革命战争形势影响,新中国对外交的认识习惯于从战争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形成了“外交战线观”。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还是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在外交战略布局上,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都是通过与其他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等布局谋势,维护国家利益。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在外交布局上强调“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推行全方位的外交和真正的不结盟,“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决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⑧,中国外交的棋局大大拓展。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②⑤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334、165页。

③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④ 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⑦ 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⑧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11页。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相互交织,中国外交呈现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立体外交格局。

一是统筹国际国内大局。在新时期,中国外交所为之努力的一切,都是牢牢立足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展的。所谓国内大局,就是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①。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的国际大局着眼,要求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国内大局,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国际大局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因此“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从国别区域外交看,十八大报告更加注重全方位外交布局,在高度重视新型大国关系、经略周边国家外交的同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布局,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要求,对多边外交则首次明确提出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重点依托。从领域外交看,除原有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外交之外,更加重视海洋、海外、网络、太空等领域的外交,并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更加重视“软实力”的建设。

二是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十八大报告已经不再仅仅把外交看作一种业务性工作,而是将其看作一种使命、责任和事业,明确提出,中国将“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贯穿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总体布局中。首先,切实增强党对外交的领导核心地位。“打铁还需自身硬”。十八大报告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②。新时期的外交要切实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拓展党的对外工作大格局,“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次,牢牢把握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外交必须始终以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己任,扎稳根基,坚定信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③。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之本,治国之要。此外,不断增强军队维护安全与发展能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④。面对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安全等新问题,不仅需要通过外交争取安全与发展,也需要必要的军事力量维护安全与发展。在阐明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同时,十分强调中国军事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强调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以及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等外交职能,为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的统筹协调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是统筹五位一体布局。十八大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对外事务,外交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是扩散到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外交的层次化和深度化趋势明显加强。在政治领域,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始终把国别和区域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在经济领域,中国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在社会领域,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同时,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文化领域,中国将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

^{①③④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

果, 加大在文化领域中的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在生态领域, 中国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的高度, 强调不仅要维护中国的生态权益, 更要为世界生态安全作贡献。

3. 在策略思维上, 强调合作共赢

政策与策略是外交工作的生命线。在开展具体外交工作过程中,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贯彻什么样的策略, 直接决定着外交工作的成败。建国以来, 中国领导人深受过去国内民主革命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 在外交上习惯于从国际统一战线的角度, 通过明确划分敌我友, 构建国际统一战线, 通过最大限度地分化和瓦解敌对力量,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吸收“三个世界”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等策略思维, 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 不头脑发热, 不感情用事, 强调冷静观察, 透过现象看本质, 看发展变化。1989年9月4日, 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指导方针。1995年12月12日, 钱其琛在外交部举办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的讲话中, 把邓小平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字方针^①。此后,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又提出了“和而不同”、“互利双赢”、“聚同化异”等思想, 强调共同利益, 强调务实合作, 中国外交政策和策略更加灵活、更加务实、更具实效。十八大报告在外交策略思维上, 继承传统, 强调合作共赢, 把共赢写在中国外交旗帜上, 确立内外结合、官民并举、各方互动和相互配合的系统外交思维, 多角度、多领域、多轨道地维护好国家整体利益。

一是转变“内外有别”思维, 确立“内外结合”的战略思维。十八大报告的一个集中思想,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内求和谐, 对外求和平, 国际国内一盘棋。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的内容较以往报告更显充实、更有针对性, 特别将中国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整体之中, 深化对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 善于从复杂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 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好统一起来, 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更好地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比如在报告中明确提到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和“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国, 这就表明外交和内政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真正确立了国际国内一盘棋的策略思维。

二是转变“归口管理”思维, 确立“官民并举”的开放思维。十八大报告不仅强调了政府外交事务, 而且还对政党、人大、政协、地方和民间涉外事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把“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确立了官民并举的开放思维。突破“官民分离”、“内外有别”的外交思维, 探索“官民结合”、“亦官亦民”的新平台, 将财经、文化、宗教、华侨、国际友好等各界别的人民组织起来, 建立和健全外交外围组织体系, 建立各种形式的协会、基金会、委员会, 营造官民联动的大舞台。

三是转变“外事无小事”思维, 确立“多方互动”的包容思维。面对中国外交事务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众多领域延伸的客观趋势, 十八大报告强调多方互动的包容思维, 强调大力开展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社会外交、文化外交、生态外交, 安全外交等新外交形式, 同各国协作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防灾减灾、防治传染病等问题, 在涉及全人类安全和生存等重大问题上贡献力量, 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关键作用。

结 论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均对中国外交转型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压力型外交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路线

^①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序言,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图进行了系统规划,在外交心态上更加自信从容,在外交姿态上更加积极有为,在外交理念上更加开放包容,在外交行为上更加进取担当,中国外交正在从“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

总体来看,十八大规划的外交形成了一种官民并举、双多边结合、国别地区与领域相协调、政经文军相配合的 3.0 版的外交布局。相比中国外交的 1.0 版和 2.0 版,中国外交的 3.0 版的目标使命更加明确,战略布局更加立体、策略思维突出共赢。一是外交目标更加明确,把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而不是像新中国成立之初那样“另起炉灶”,搞“世界革命”;也不是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求“和平发展”,谋“和谐世界”。中国外交的角色正在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参与者”向“积极的改革者”转变。二是战略布局更加立体,是一个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党政军整体联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外交共同体,致力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治党治国治军、统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格局,与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发展外交关系,铸造中国立体外交的战略布局。三是策略思维突出共赢,强调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要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宣告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所有这一切均贯穿着合作共赢的思维,而不是片面强调以意识形态画线和以国家利益画线。在此种思维主导下的中国外交,不仅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和执行者,更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等世界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和贡献者。

总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打造立体外交布局,贯彻合作共赢思维,三者共同造就了 3.0 版的中国外交,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在这一崭新的外交时代,如何创新思维,立体操作,努力构建国内国外相互协作、各部门各层次有力配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复合联动的立体外交运筹体系,不断开辟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中国外交新局面,将成为十八大后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李 申)

China Diplomacy 3.0: China New Diplomacy in Post 18th Party Congress Zhao Kejin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increasing involvement i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essu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ension both shown a trend of steadily increasing, which become a harsh challenge for China's diplomacy to keep on a series of strategic principle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at demands necessary diplomatic transformation with broaden horizon and on higher platform to assure China on the right track of developing peacefully. During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hinese leaders have set up new plans about China diplomacy, which means changing from negatively undertaking to positively planning in its mentality, attitude and concepts.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China's diplomacy will show 3.0 version diplomacy of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diplomacy in revolution or reform era.

Keyword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China's Diplomacy